

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及其意义

王 峰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作者简介: 王峰, 法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2024JZDZ028)。

【摘 要】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 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时期, 一批外国记者、军事外交人员、学者等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 考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战, 以个人日记、政策报告、新闻报道等方式记述并传播了他们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在这些外国人的记述中, 中国共产党被塑造为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赢得人民拥护与支持、领导人民英勇对敌斗争的崭新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和传播, 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增强领导全民族抗战历史主动权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 而且为深化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实支撑。

【关键词】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 在华外国人; 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25)04-0030-10

抗日战争时期, 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詹姆斯·贝特兰、托马斯·亚瑟·毕森和欧文·拉铁摩尔等外国著名记者、学者以及美国军事考察团等, 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感受, 撰写了大量个人日记、政策报告和新闻报道, 以不同方式把它们传播到国统区甚至国际社会。这些在华外国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记述, 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崭新形象, 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叙事框架, 不仅向外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认知, 为我们党更好地领导敌后抗战创造了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历史内涵, 为深化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实支撑。目前, 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地位和作用^①, 对其形成原因的探究则相对较弱。本文以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为研究视角, 重点分析“他者”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抗战地位和作用的形成逻辑及其价值, 以就教于方家。

一、在华外国人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时代背景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 在日军的攻势下, 华北战局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逐步变为以中国共产

^① 代表性学术论文有: 赵兴胜的《如何认识中共的先进性? ——抗战时期西方观察家的思想、实践与经验》(《广东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4 期), 吕彤邻的《美国馆藏中共抗战解密史料汇编——西方见证人眼中的敌后根据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5 期), 洪富忠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建构——以大后方为中心的考察》(《党的文献》, 2019 年第 6 期), 赵学勇、王鑫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中国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4 期)等。

党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成为牵制日军的重要力量。国民党出于限制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目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战进行消息封锁，致使外界不能准确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中国抗战中发挥的真正作用。为赢得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策略，充分发挥在华外国人在舆论宣传中的作用，为塑造自身形象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政治力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旗帜，一方面组织和领导社会各阶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制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方针，通过开辟敌后战场、创立抗日根据地，积极领导人民开展对敌斗争，在此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政治力量。

日本侵华战争，是妄图灭亡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要动员全国各民族起而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在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明确提出“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①的战略方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建立办事处，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而直接的接触，宣传抗日民主主张，初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例如，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的新形势，依靠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建立的党的秘密领导机关，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领导下，南方局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以及在华外国人等广泛接触，并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发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主张，推动我们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在政治上的影响不断扩大。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部任务要靠坚强的组织体系来实现，没有党组织的有力保障，组织和领导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无从谈起。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的组织在领导抗战中力量弱小的问题突出地暴露出来。1937年11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②为使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并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③。在此基础上，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④的发展计划，强调要依靠党的组织体系来贯彻党的路线政策，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相继在华北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冀鲁边、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广泛动员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纷纷建立了抗日政权；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3—474页。

②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4—395、60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

通过游击战争,大量牵制、消灭日军。到 1940 年底,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 5 万余人发展到 50 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各抗日根据地在 1944 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 2 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 20 万人,攻克县城 20 多座,攻克和逼退敌据点 2500 多个,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人口 1700 多万。”^①随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敌后抗战发挥了配合正面战场使日军腹背受敌的作用,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军事实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二)中国共产党成为亟需被世界认识和了解的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抵抗日伪、发展生产、保护民众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根据地居于敌后,加之国民党的消息封锁,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状况并不清楚。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事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真实情况,成为具有战略价值的重要信息。

斯诺作为美国《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及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兼任特约通讯员,对中国的战事极为关注。他是第一个访问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人。1936 年 6 月,在宋庆龄的支持下,斯诺开启了为期四个月的西北访问,并撰写了轰动全世界的《西行漫记》^②。斯诺在《西行漫记》开篇所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支持着他们?”“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③这不仅是斯诺进行新闻报道的一种策略,更反映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时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普遍看法。尤其是七七事变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抗战的发展趋势,急切地想了解中国不同抗战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七七事变爆发时,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正在日本采访。在战争爆发的第四天,他即从日本赶到中国采访,并于 1937 年 10 月奔赴西北寻找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其目的是要看看“在这个举国一致抗日的战争里面,中国的红军将要占一个什么地位呢?”“在这新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将怎样行动呢?以他们轻兵器的实力,怎样才能有效的去和日本强有力的飞机大炮对抗呢?”^④1937 年 12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中国的 secret 观察员、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卡尔逊上尉,先后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临汾以及晋察冀边区、延安、绥远、晋绥、冀中、冀南和山东等敌后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向罗斯福报告他所见到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敌后抗战情况^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牵制日军的重要力量,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日作战策略以及研判中国战后政治走势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1943 年 12 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费正清,在重庆服务期满即将回国之际,专门将自己在重庆工作 15 个月的所见所闻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同事,称自己“也能够证明,从前很多坚定的反共亲美派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大多数的美国人,如今却持有与共产党一样的观点”,国民党的政客们“只是一群毫无道德的机会主义者”,“如果相关的负责人无法亲临现场而仅仅是通过个人经验来开展工作的话,这是很不正确的、不理智的做法,同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成功也有着相当大的危险”^⑥。1944 年 7 月至 1945 年 4 月,美国政府专门派出军事考察组,赴敌后根据地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及其敌后根据地的战略价值。他们发回报告:“在国民党用武力驱逐共产党的地方,共产党获胜了,因为他们得到了人民的民支持。国民党没有这种支持,也不能得到这种支持。这一事实,加上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632 页。

② 为避开国民党的书报审查,便于公开出版,斯诺将自己的采访报道命名为《西行漫记》,后改为《红星照耀中国》。

③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4 页。

④ [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年,第 335 页。

⑤ [美]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刘山、周水玉、李森、高航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年,第 149 页。

⑥ [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阎亚婷、熊文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第 322—324 页。

与战争有关的困难，迫使国民党撤退。”^①“一个统辖着这样广泛的地区，而且全是由中国人自己掌管的政府能够得到民众的积极支持，使民众能够参与发展工作，这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②这些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报告，为美国政府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情报，并且当这些信息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比的叙事方式在国统区和国际社会上传播时，极大地强化了外部世界了解真实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三）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对外宣传策略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的态势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形势的发展。将敌后战场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格局中，主动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情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民族抗战背景下制定的重要战略。所以，当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消息封锁和形象“丑化”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反击措施。其中一条策略，就是发挥在华外国人在舆论宣传中的积极作用。

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对正面宣传我们党的形象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也让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加强对外宣传、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性。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外宣传的体制机制。一是成立相关的对外工作和宣传机构。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专门负责接待的交际科，并于1940年改为交际处，以适应日益扩大的对外交流和接待工作。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海外工作委员会，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沟通，创造有利于传播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的条件。1944年，在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期间，交际处还增设了研究科、翻译科及行政科等。二是主动邀请和热情接待外国来访者。为便于外国来访者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我们党将接待外国来访者作为重要任务，不仅党的领导人亲自接待和接受访谈，而且还为外国来访者考察与访谈提供保障和便利条件。1944年8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专门规定：“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国际间统一战线地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③斯诺夫人海伦·斯诺根据自己在延安的见闻，以尼姆·韦尔斯的笔名撰写的《红都延安秘录——西行访问记》，不仅收录了70位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个人简历，而且在采访朱德、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蔡树藩、董必武、王震等人基础上专门撰写了小传，塑造了一个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群体形象。三是针锋相对回击国民党的诋毁和造谣。对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消息封锁和恶意中伤，中国共产党不仅充分利用根据地的报刊和集会给予批判，而且积极利用国统区的有利条件给予回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在陪都重庆的有利条件，通过《新华日报》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消极抗战的种种表现，不仅有效抵制了国民党的诋毁，而且激发了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战实际情况的热情。

二、在华外国人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典型样态

在华外国人基于自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感受，在他们的记述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了“他者”视角的塑造，构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叙事范式。这种新的形象以

① 蔺晓林编、吕彤邻主编：《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戴维斯、谢伟思与实用外交》，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第282页。

② 陈敦德：《接触在1944：美军观察组》，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9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3页。

新的叙事方式在国统区和国际社会的传播与扩散开来,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领导全民族抗战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这些外国人的记述中,中国共产党被塑造成为一个在革命斗争的环境中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党形象。

在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同党内各种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在有关敌后根据地见闻感受的记述中,存在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学习的描写和评价。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详细记录了延安学校开设的理论学习课程,诸如“辩证法、列宁主义、中国革命史、统一战线理论、日本帝国主义分析、游击战和军事训练战术,还有像毛泽东和洛甫等重要共产党领袖的专题演讲。”^①在这些记述中,延安整风是批评那些教条主义者僵硬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美军观察组在发给美国国务院报告中写道:延安整风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表述,也是民族主义的:坚决主张党的思想必须是中国式的;反对外国(即苏联)的影响和模式”^②。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和总结经验的做法也给这些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劳动联合新闻社及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杂志的驻华记者爱泼斯坦认为,中国共产党重视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原因在于“被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并且无法指望任何外部的物质支援,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养成了一个习惯,用事实指导行动,根据事实行事。”^③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费正清后来在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高度称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意义,认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组织和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主张是多么不现实,而毛泽东着重动员农民以夺取政权和改变不可容忍的农民生活情况又是多么切中要害。”^④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这一特征的刻画,不仅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而且深刻地认识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要求。

(二)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在这些外国人的记述中,中国共产党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内部的团结一致,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方式,从中央领导人到基层普通党员,纷纷以这种方式进行“洗澡”“治病”,由此实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这些外国人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党员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实现党内团结与统一的重要途径。白修德、贾安娜在他们的记述中写道:“共产党人经常地在进行着自我检讨的整风工作,他们总是用一面放大镜在那里检验着他们自己的过失。他们痛击着自己的胸膛以保证自我的改进,他们为自己的失错而悲哀和忏悔。在各地,这种行政上的批评自由形成了中国农民所未有过的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地方上的会议可以接受他们的控诉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可以说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成了这个社会里的平等公民。”^⑤斯坦因也称赞

①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② [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王益、王昭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39页。

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张立程、付瑶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90页。

④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76页。

⑤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60—261页。

延安的党员干部“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热情，真正准备尽可能改正错误，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不惜改正若干久已被认为最后解决的政策”^①。不仅如此，在美军观察组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在美国陆战队员卡尔逊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件中，也都有大量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详细介绍。他们写道：“他们似乎通过在整风中进行自我批评而感到精神振奋、清白无罪和团结一致……它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作为一个使人思想转变和加强热情与信仰的手段。”^②“他们不断地批评自己，也请别人来批评自己。他们说只有了解自己的错误，才有希望纠正错误。这种态度对传统中国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③实际上，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正是通过学习、对照、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既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问题，又着重抓住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使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得到了克服和纠正，为增强全党的团结与统一扫清了思想障碍。

（三）赢得人民拥护与支持

如何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民族抗战过程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为增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些在根据地参观考察和采访的外国人发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的记述中，“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④“在共产党里，他们没有正式的阶级区分，可是毛泽东却是受着最高的爱戴和尊敬。”^⑤在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看来，延安在政治生活上呈现的显著特征就是消灭阶级差别，“表面现象所展示出来的东西，其实是蕴涵在更深层次上的根源。除却插在朱德或周恩来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那支钢笔之外，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红军司令员与普通士兵的军装，竟毫无区别。”^⑥根据地无差别的阶级关系、共产党干部身上体现的平等观念，使爱泼斯坦无比感慨。他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边区一个县看到的一位老农，这位老农捶拍着原来是他村里一个苦孩子的年轻县长的背说，‘你看这家伙背了多少筐粪到我们地里？有谁以前看见过这样的官？从前，当官的闻的是他们姨太太的香水味，怎能闻这样的大粪呢？’……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官员，也没有人见到过这样的情景。”^⑦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在他的采访报道中详细记录了与绥德“资本家”安文钦的谈话内容，批评国民党“以前官僚架子太多了，有地位的地主商人，不办一套公式手续，也不能见国民党县长”，称赞共产党干部“没有官僚习气……任何人都可以去见大官，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毛泽东也很平易近人，愿意接见任何人。现在老百姓和官在一起，就像在家里一样”^⑧。美军观察组在给美国国务院发回的报告中也毫不吝啬地赞扬中国共产党，称“共产党已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因而使他们之被消灭成为不可能，从这基本的事实，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⑨。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党，不仅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更是由抗战时期严峻的斗争环境所决定的。这些外国人的观点，正是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过程中“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奠定了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

①⑧ [美]冈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72页。

② [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王益、王昭明译，第237页。

③ 武云编、吕彤邻主编：《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卡尔逊与罗斯福谈中国：1937—1945》，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第55页。

④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87页。

⑤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58页。

⑥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李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47页。

⑦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张立程、付瑶译，第236页。

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7页。

(四)领导人民英勇对敌斗争

那些深入敌后根据地的外国人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不仅没有被敌人的“扫荡”所吓倒,而且勇敢机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敌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们党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场形势变化,制定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①的基本路线和工作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我们党在敌后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游击战,破坏敌军交通路线便是其中的一种。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山西前线目睹了八路军破坏日军交通线的作战策略,他在《华北前线》和《日本在华北的进攻》中多处描写和评价敌后游击战的策略与作用。他写道:为解决没有正面应对日军坦克车装备的问题,八路军就想出了在日军经过的路段埋设炮弹,炸毁途经的坦克车的方法;在日军用强迫中国农民乘着重重的牛车走在坦克车前面的方法探测炮弹后,他们又改变策略,将埋设在铁路中的炮弹换成“拉索”控制的大炸弹,管控炸弹的爆炸^②。八路军和游击队通过不断努力,切断了日本交通线上的多条铁路与军事公路,有效阻止了日本向晋南主力部队提供增援和运送物资^③。

在领导人民反抗日军侵略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建立了五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百分之九十的广大的中共控制区,在地图上都是标识着‘日军占领区’的”^④,所以国民党刊物中“没有一个河北县城在八路军手中”的宣传,但当外国人真正来到敌后战场,则发现八路军与游击队已经“把敌人的阵地限制在铁路公路沿线狭窄的地方,和沿海狭条或大城市周围的小圈子里”^⑤。对于这一点,在华北和华中各地区降落、同时被八路军拯救的美国飞行驾驶员的自述便很有说服力。这位名叫巴利奥的中尉曾汇报过自己被华北八路军和游击队救援的路线图与具体过程,在他看来,他跟随着游击队不规则地频繁转移,以至于到后来他的行踪“对外已不是秘密”,但日军“仍无法得知他到底在哪里”^⑥。不仅如此,八路军还在压缩日军的“据点网”。据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观察,这些据点最后“只剩下了周界上一些碉堡还巍然孤立着”,“在过去一年中,八路军从包围线的内部发动反攻,已经消灭了四分之一的据点”^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以“游击战”的名义实施“游而不击”的策略,是抗战时期反动力量诋毁中国共产党抗战作用的惯用伎俩。在华外国人详细描述游击战的作用和表现,刻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进行英勇抗战的伟大形象,有力地反击了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诋毁和污蔑。

三、在华外国人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既为“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敌后抗战的客观事实,为我们党增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丰富了抗战时期我们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内涵,为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丰富史料。

(一)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的崭新形象

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崭新形象、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是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关于中国共产党形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37年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第192页。

② [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第201页。

③ [英]詹姆斯·贝特兰:《日本在华北的进攻》,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吴景平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3年,第358页。

④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第223页。

⑤ [美]冈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第156页。

⑥ [美]威尔伯·J·彼得金:《深入中国1943—1945: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见闻》,袁西玲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179—182页。

⑦ [美]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陶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43页。

象塑造和传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们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构建起崭新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战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这些外国人的笔下，中国共产党不仅不是国民党宣传的所谓“土匪”、“强盗”，反而是一群信念坚定、有着强大群众基础的为中华民族利益而斗争的奋斗者。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深深改变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固有认识，使国内外的读者被中国共产党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和意志感动，敬佩和向往成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认识。国统区的青年通过这些报道，为中国共产党领袖身上的革命奉献精神 and 人格魅力所吸引。“读了《西行漫记》，使我从理论上进而到形象上具体清晰地见到了共产党人，如亲临其境。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和光明？就在这里找到了。看得见，摸得着，不再是抽象的了。我也要做这样的人，我看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我一连几天看完了《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存在一个新世界。过去只听说‘朱毛’，看了书后，知道这些人都是当代的英雄。过去国民党的宣传诬蔑都是假话。《西行漫记》对我来说，可说是一把钥匙，启开了我思想上的新天地。”^①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同样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②在华外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使外界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以及整个敌后根据地军民融合的真实景象，为营造一个有利于我们党发展壮大的政治环境创造了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高度评价斯诺访问陕北的重要意义，称“斯诺到我们这里来调查研究我们的情况，而当时没有别人这样做。他向外界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以此来帮助我们。……即使斯诺以后做不利于我们的事，我们也永远铭记他对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是第一个为统一战线间建立必要的友好关系而铺平道路的人，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③

（二）丰富了敌后抗战的历史内涵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一批在华外国人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敌后抗战的历史过程，其本身就是我们党领导敌后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这些来到敌后根据地的外国人，不管是记者、外交人员、军事人员或专家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和军队人员进行了访谈与接触，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敌后抗战的探索实践，丰富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历史内涵。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研究这段历史，不仅要从中国自身的视角探索党在制度建设、理论创新、实践探索等方面的举措，而且要从“他者”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实践和成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理解和认识我们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历史内涵、价值与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些在华外国人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历史书写，为人们提供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途径。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出版后，“很快受到了同代人的欢呼喝采，被誉为了一本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被认为“是一本更注重实质、较少受制于印象的第一手资料文献”^④。美军观察组成员将撰写的政治报告发给美国政府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和偏见，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官员和军队指挥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作为美军观察组组长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曾建议，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下却能凭借一己之力抗击大量侵华日军，实属对日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如果给予其一定的武器援助，就能大大提高其战斗力，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⑤。显然，这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77页。

② 刘力群主编：《纪念埃德加·斯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460页。

③ [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党英凡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33页。

④ [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郑志宁、黄际英、高二音、简明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42—143页。

⑤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修订本)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1页。

些在华外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大大扩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历史内涵,为我们正确认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三)提供了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手史料

史料是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史料,治史就无从谈起。广泛发掘、搜集、考订、编纂、解释中共党史史料,用新史料弥补已知史料的不足,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某些客观史实的认识,使中共党史研究更加全面和客观。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手史料。

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书写,诸如爱泼斯坦的《我访问延安:1944 年的通讯和家书》^①和《人民之战》^②,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③,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④,福尔曼的《中国解放区见闻》^⑤,贝兰特的《华北前线》^⑥,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⑦等,以及散见在《纽约时报》《密勒氏评论报》《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体上的相关报道,保存在美国档案馆的美国驻华使馆和美军观察组整理的相关调查报告等材料,为我们开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权威资料。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言:“在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同埃德加·斯诺 1936 年赴延安相提并论。这两次对国民党的封锁穿透,标志着西方在中国共产主义问题上,已经从那种强制性沉默和对事实全然无知的年代中走了出来。在 1944 年到 1945 年间,外国记者的文章向人们展示了一件已经消失很久的东西,即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资料。”^⑧因此,我们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史的研究,需要把中国共产党置于更加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广泛搜集和整理相关史料,弥补已知史料的不足,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水平,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党史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在编写过程中多处采用了作为当事人的外国人的资料,以与国内史料的相互印证,增强历史事实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为我们开展抗战史研究提供了典范。例如,在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英勇抗战时,《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就征引曾经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工作过的英国人林迈可的回忆录《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的部分内容:“物质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我从我的工作接触中体验到,中共的领导者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一流的。”^⑨这种利用国外史料和局外视角分析问题的方式,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真实政治形象及其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四)积累了有效开展对外宣传的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实地考察和采访,突破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困和新闻封锁,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对当前增强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方法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对外宣传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原则,既要充分利用自办平台,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也要借助外国媒体力量;既要根据海外不同受众的需求,建立不同平台的发声主体,有效地整合各类传播主体的内容生产,更好地满足差异化、分众化受众的

①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我访问延安:1944 年的通讯和家书》,张扬、张水澄、沈苏儒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年。

②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贾宗谊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年。

③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

④ [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年。

⑤ [美]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朱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

⑥ [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年。

⑦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年。

⑧ [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郑志宁、黄际英、高二音、简明译,第 149—150 页。

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年,第 214 页。

需求，为立体化的国际传播贡献力量，更要加强与西方主流媒体在新闻传播、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业务发展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外国记者的口和笔向世界展示中国，增强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客观性。既要邀请西方中立政要、学者、媒体来华，鼓励外国友人讲“中国故事”，又要把握住西方媒体采访报道的机会，借助其网站、频道、版面播出我们的节目，刊发我们的报道，提高传播实效。在立场上，坚持塑造正面形象与批驳错误观点相结合。一方面要重点讲好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势和国际贡献，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和及时跟踪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最新动态，掌握部分海外媒体污蔑、抹黑的不实报道，揭露其真实目的，有力批判国际社会的错误观点和认识。在内容上，坚持理论阐释与实践展示相结合。在进行理论阐释时，不能停留在文字表面，要深挖文字背后蕴含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既要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生成、精神内涵和价值意蕴，又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产生的具体过程和生动实践。在进行实践展示时，既要坚持百年来的历史性成就源于党的坚强领导的根本原则，充分利用好百年党史这部最权威、最全面、最准确的教材，又要从基层的小故事、小人物、小事件入手，通过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真实感受，对中国实践的切身体会，反映出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是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际视角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是新时代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华的外国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认真地观察和详细地记录，在这些外国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记述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赢得人民拥护与支持、领导人民英勇对敌斗争的伟大形象，为领导敌后抗战作出了巨大牺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以“他者”的视角，为我们生动地塑造了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的崭新形象，使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逻辑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道理，也为我们在新时代牢牢掌握中共党史研究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历史经验。

(责任编辑 武晓阳 责任校对 武晓阳 宋 媛)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y Foreigners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WANG Feng

(School of Marxism,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a just struggle by the Chinese people to resist Japanese militarist aggression and achiev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as well as an inseparable and vital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War Against Fascism. During this period, foreign journalists, military-diplomatic personnel, and scholars ventured into rear base areas to investigat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leadership in resistance efforts. Through personal diaries, policy reports, and news coverage, they documented and disseminated their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Communist-led resistance movement. In these foreign account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erged as a pioneering force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study with practical exploration, courageous practice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strong popular support through grassroots engagement, and heroic leadership in organizing anti-aggression struggles. This international narrative construction has not only helped to shape favorable public opinion fo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directing the nationwide resistance, but also provided substantial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for deepening academic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wartime period.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eigners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